

鼓浪屿文史资料



鼓浪屿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厦门市鼓浪屿区委员会 编

2000年8月

目 录

三十年代福建革命斗争指挥中心

- 记鼓浪屿虎巷8号省委机关…………… 胡冠中(1)
- 我的回忆录…………… 张圣才(5)
- 谁最早获得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何水道(38)
- 鼓浪屿“神州医院”的一段革命活动…………… 叶君伟(43)
-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厦门的社会文化活动…………… 张宗洽(47)
- 鼓浪屿见闻录(一)…………… 洪卜仁(61)
- 厦门大学与鼓浪屿的一段因缘…………… 林其泉(68)
- 黄奕住回国后大事记…………… 叶更新等(74)
- 陈寅恪的得力助手黄萱…………… 伍童勇(86)
- 科研育人两丰收的著名数学家李文清教授…………… 张 夏(93)
- 当代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 林寒生(100)
- 画家顾一尘先生…………… 林懋义(104)
- 我的老师孔继昭…………… 曹华伟(108)
- 太虚大师和弘一大师在鼓浪屿…………… 陈全忠(112)
- 郁约翰医生生平业绩述略…………… (美)马休著 (117)
何丙仲译
- 创建厦门市博物馆的经过…………… 龚 洁(127)
- 郑成功珍贵史料的发现与出版…………… 张宗洽(141)

三十年代福建革命斗争指挥中心

——记鼓浪屿虎巷8号省委机关

胡冠中

在巍峨壮丽的鼓浪屿日光岩下，有一条短而狭的小巷，名叫虎巷。虎巷尽头8号是一幢两层高的楼房，面积不足两百平方米。但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它曾经是福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经过1927年“4·9”国民党反革命事变，厦门处于最黑暗的时期之后，就在当年12月成立了中共福建省临委，领导福建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28年8月，福建省委正式成立，刘乾初、陈昭礼、黄钊等同志曾担任或代理过省委书记，但罗明担任省委书记的时间最长，直到1931年初调离福建到上海为止。在省临委和省委成立之后，领导过著名的平和长乐、永定及龙岩后田等地的农民武装暴动，领导过1930年5月25日震撼全国的厦门破狱斗争，农民、工人、学生运动和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时至1930年6月，省委机关曾设于中山公园北门附近的一座民房。后来，省委同志发现同在一座楼房里住了可疑的人。罗明断然决定搬家，叫刚从闽西调来的曾志同志到鼓浪屿去找一座适合隐蔽的房子。当年才19岁的曾志年青美貌，举止斯文，不易引人怀疑，比较容易租到房子。她不厌其烦找了好几座，相比之下，觉得虎巷8号较为合适。

那虎巷8号分前后两排。正门在前排,是平房,商定留给房东居住;后排有一层楼房,可从边门进去,可供省委机关使用。那房东只有婆媳二人,一般平民百姓,便于相处。曾志出面去租用时,言明是来厦门做生意的一家人,有男有女,有大有小。罗明是省委书记,年纪较大,便充当老板,也是家长,他的夫人谢小梅就是老板娘,也是大嫂。住在一起的有省委秘书长杨适、组织部长谢景德、宣传部长王海萍,还有刻写钢版的梁云屏、高大安等人。为了装扮得像一个商人家庭,有人搞家务,中共闽西特委调来一位名叫郭香玉的女同志,公开说她是“佣人”。军委书记蔡协民和军委秘书曾志,因为房子不够住,便另外租住福州路127号2楼。据曾志回忆,楼上最后一个房间(称角间)较大,隔成二个房间,内间为罗明夫妇寝室,外间供梁云屏、高大安刻写钢版使用。郭香玉带来一位十五六岁的儿子,名叫黄业章,他的任务是省委交通员,每天到厦门市一个秘密联络站联系工作。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住在这里的人,都有自己一份工作,大家各尽其职,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佣人”郭香玉这个角色是很辛苦的,她要精打细算采购每天的食物,既要节省,不能超过伙食标准,又不能让人觉得寒酸;她要扫地擦地板,又要给全家人洗衣服,样样都要做得像个“佣人”。罗明等省委领导人,工作任务之重是不言而喻的,经常夜以继日,在暗淡的煤油灯光下阅看全省各地送来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写请示汇报。担任机要秘书的谢小梅,常到街上买来一匹白布,小心地拆开包装,把给党中央的请示汇报,用密写药水写在白布上,然后重新包装,再由政治交通员梁惠贞送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一天天，省委机关从书记、部长到工作人员，艰苦而紧张地生活与工作，没有说一声苦与累。1930年12月，省委组织部长谢景德到泉州一带巡视工作，因劳累过度患病，治疗无效，病逝于鼓浪屿，组织部长一职由杨适兼任。次年1月，常委书记罗明夫妇及团省委书记王德调到上海党中央，由王海萍代理省委书记，宣传部长一职由李国珍接任。

1931年3月25日，虎巷8号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财物及档案文件被洗劫一空，在机关的同志全被捕，其中有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杨适、宣传部长李国珍、王海萍夫人、政治交通员梁惠贞、“佣人”郭香玉、工作人员梁云屏及高大安等六位同志。住在福州路127号的军委书记蔡协民及秘书曾志，外出工作的省委代理书记王海萍及交通员黄业章，均幸免于难。省委机关遭到如此重大的破坏是历史上所没有的，代理书记王海萍心焦如焚，同军委书记蔡协民、团省委书记董云阁商讨之后，亲自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被捕的六位同志被关押在中山公园西边的公安局拘留所，由当时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讯。那六位同志个个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杨适同志被捕不久，被押往南京，慷慨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李国珍、梁惠贞及厦门市委的郑裕德、林树根一起，于同年5月1日凌晨被杀害，血洒厦门。“佣人”郭香玉被捕后，咬定是被雇用的佣人，坚不吐露实情，整口牙齿都被打掉了。一年后出狱，沿途乞讨，餐风宿露，回到龙岩寻找党组织，继续投身革命。梁云屏、高大安年纪小，被驱逐出厦门。

1931年7月，从上海回到厦门的王海萍，遵照党中央指示，因干部缺乏，不再恢复福建省委，分别成立厦门与福州两个中心市委。从此，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领导厦门和闽南的16

个市、县。厦门中心市委书记是原代理省委书记王海萍。

半个世纪后的 1982 年，罗明夫妇应邀从广州回到福建。他俩来到厦门期间，旧地重游，找到虎巷 8 号，罗明肯定地说：虎巷 8 号就是 30 年代初期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

我的回忆录

张圣才

编者按：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撰委员会于1988年间向民革福建省委征集解放前福建民联地下活动的史料。民革福建省委以张圣才同志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迎接解放做过有益的工作，请张老将这时期同中共联系的历史和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张老因此写成《1946—1949年我的革命地下活动》一文，文后又加“附注”简述他“九·一八”之后至1946年的活动情况。现征得张老同意，将此文发表，供地方史研究者参考。题目改为今名，并将“附注”移至文前，以便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便于阅读。文中偶有错字，迳予改正。

“9·18”之后，我立即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同“安内而后能攘外”的错误路线作斗争。1931年10月我在厦门组织全国第一个公开挂牌的《厦门抗日救国会》。1933年我参加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闽变”。1934年我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1936年我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1937年我在国共团结抗日大原则上，参加军统的抗日情报工作，直到胜利，抗战号称八年，我的反日活动却是15年。

在那15年中，我被国民党逮捕三次。第一次因为我是中共群众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闽南分会主席。第二次被捕，因为我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第三次被捕，因为我参加陈铭枢发起的中华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这一回被捕押送南方特务监狱，到1937年芦沟桥事件后，才以释放政治犯名义，恢复自由。

1937年8月8日，我从南京特务监狱被送至戴笠的办事处。戴笠要我参加军统。当时我不知道国共团结抗日，对戴笠这个主意不加思索地回说，“我现在心如枯井，对政治全无兴趣；假使你肯让我回家，我只想当个小学教师养养母亲”。戴笠说：“你不是要抗日么？现在大家要抗日为什么你却又消极了？”我问“谁要抗日？”戴笠说：“是的，在里头（指狱中）没让你看报，你不知道。我们已经同中共达成协议，要团结抗战了”。他顺手递给我一张中央日报，证实他的话，然后问我有何意见，我说，既然决定抗战，我当然要参加。但是我有三点意见，请你考虑：（一）我只做抗日工作，不干预国内政治摩擦；（二）不能派我去做反间；（三）让我先回厦门看看母亲。戴笠说，这三点都好办：第一，国共已经合作，再也不会有摩擦了，即使有摩擦，我现在答应你，决不叫你干预。第二，你一贯反日，敌人完全知道，派你去做反间，岂不是送肉去喂老虎。第三，现在厦门是前线，正想让你回去厦门，你可以即日起程去看母亲。——这就是我参加军统的经过。有人说我是被迫参加的，其实我一听说要抗战，便自觉自愿参加。说句大话：蒋介石接受人民抗战的要求，人民服从他的领导，是一种公平交易，我没有违背原则。

参加军统后，我首先任厦门特别组长。厦门沦陷后我任闽

2
南站站长,因为同当时省主席闹意见,调上海区任组长。1939年8月被法国捕房逮捕,释放后身份暴露,调香港区任组长。

1941年派遣菲律宾任潜伏组长。1945年6月返回重庆,1946年脱离军统。

1937年11月我去菲律宾了解情况,路过香港,经庄希泉同志介绍与中共华南局书记连贯同志联系。我把参加军统情况全面向他交代。自后我就成为他的外围同志。可以说,我早于1937年就与中共华南局发生关系了。

我於1945年6月由菲律宾返回重庆,陈铭枢和吴艺夫同志就把《民联》组织告诉我,征求我参加。当时日本还未投降,我还是军统人员,怕有不良影响,要求以外围关系,协助工作,等脱离军统后再行参加。1946年秋天,我由陈铭枢、吴艺夫主盟,参加《民联》,回福建活动。我通过吴艺夫、陈锡襄同志与陈铭枢通信联系,自己也多次去上海与南京《大士农场》向枢汇报工作,请示问题。

I
1948年1月间,吴艺夫约我去香港会晤朱蕴山同志,那时候李济琮同志正从事组织《民革》。朱老两次和吴艺夫、洪文德、黄品枚和我见面,传达《民革》组织经过,收集我们的意见,并指示我们革命的方向。我把我在福建活动情况向他汇报,得到朱老的肯定。

1948年5月间,陈铭枢、吴艺夫在上海环龙路江卓云家请刘通同志和我吃饭。席间,陈铭枢告诉我,组织上决定由刘通同志主持福建工作,叫我以后和刘通同志联系,我衷心表示拥护。

1948年10月间,我由闽变战友陈公培(即吴明)同志和杨东莼教授介绍去香港见中共华南局书记潘汉年同志,接受

中共任务。为工作便利，潘汉年要我直接和他联络，我和刘通同志的关系由他通过组织向《民革》请假。从那以后，我便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直到厦门解放。解放后，我在省委联络处领导下工作。1953年调省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1954年恢复民革关系，中选民革省委。现在把我的工作情况分别汇报。

1、在上海创刊《真理与自由》半月刊

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和陈乃昌同志合办一个半月刊名《真理与自由》。这个刊物响应中共号召，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开放政治，释放政治犯，要求团结，反对内战，以陈乃昌同志为发行人，黄嘉历为经理，联系李纯青、林林、蔡仪、施复亮、徐放及其他若干进步人士写稿。我提供经费及馆址。《真理与自由》的言论得到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张执一同志的赞扬，追认它为党的地下刊物。

这个半月刊于1946年元月发刊，到同年6月被国民党勒令停刊。

2、参加“闽人治闽”活动

1946~1948年，京沪福建同乡，出于闽人治闽的历史愿望，发起拥护吴硕同志任福建省主席的活动。我经由我的老师陈锡襄和吴艺夫同志的介绍，参加了这个活动。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士，各有各的动机，我和陈锡襄及吴艺夫的观点是：(1)吴硕是民联同志，争取他当省主席，有可能为和平解放福建铺平道路。(2)“闽人治闽”的呼声，是几十年来福建人的老口号，对

国民党当权派来说，只是一个地方主义的重演，和中共没有关系。利用这个口号来进行革命活动，是一掩护。

我和吴硕同志密切配合，在他的指示下，我和吴硕的另一个华侨朋友陈荣芳，对海外华侨和闽南政治上的人士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发动菲律宾、新加坡两地的华侨通电拥护，但由于一些复杂原因，拥护吴硕同志的活动没有达到目的。

为了同上意图，我仍然以“闽人治闽”的口号，怂恿张贞争取福建主席职位。张贞不是革命同志，拥护他只能起到利用的作用，这是我们早有认识的。张贞晚年有点私心杂念，加上一贯作风，马马虎虎，相信我们的一些朋友有可能左右他的动向。我资助张贞去南京通过何应钦关系，打通了蒋介石。蒋介石召见张贞，主动征求他回主闽政的意见。张贞为表示礼貌，谦让年老恐无能胜任。蒋介石本来知道张贞不是材料，召见张贞是敷衍何应钦，及听到张贞谦辞，立即改口问说，那么你看福建还有何人堪当此任。张贞至此，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好顺水推舟，推荐李良荣以自代，蒋介石立即拍板，表示同意。拥立张贞的活动又告失败，但是我们在“闽人治闽”这个口号的掩护下，取得发展《民联》地下组织的便利，还是我们的实际效益。

3、增添一层掩蔽体

参加《民联》之后，我把这个组织当为革命的秘密组织，应该避免暴露。为进一步保密着想，我运用《中国现代化促进会》这个名称，来做《民联》的代号。对初步争取到的同志，我们

不说《民联》，而说《现促》。

《现代化促进会》是我在菲律宾发起的政治团体。1945年美军光复马尼拉之后，我从美国来客及美国报刊了解到蒋介石和中共的摩擦，知道抗战胜利后，国内还有一场艰苦的政治斗争，甚至发生内战。我在回国以前，便跟十几位华侨同志发起组织《中国现代化促进会》，准备以华侨名义来干预国内政治。但回国后不久，就参加《民联》，认为没有必要另起炉灶，所以不去发展《现促》。但是这个组织起源于海外，有一定的华侨后盾。我认为用这个名义来为《民联》吸收同志，万一发生问题，还可运用一些海外关系来招架一下。

因此，我对一些朋友，首先介绍他们参加《现促》。

4、争取作个生意人

抗战前为了推动抗日，我三次入狱。抗战期间，我虽然有所表现足以说明，我除了抗日以外，没有其他政治要求。但是胜利后，国民党仍然不放心我的政治动向。这个情况，对我的革命工作是不利的。所以我首先致力于改变我的社会形象。我在1946～1947年间，创立或参加好几个商务机构，目的在以生意人的面貌来掩护政治活动。

1946年3月我在厦门创立“厦门互惠实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4月在上海参加组织《启南实业公司》任董事；7月投资福建农林公司任副董事长；10月参加中国工矿银行任董事；1947年和许显时、何公敢二位同志创立福建渔业公司任副董事长。这些商务机构都是黄其华同志引进华侨资金创办，让我挂名做政治掩护的，大大改善了我的社会条件。

5、争取闽警班学员

闽警班全称福建警官学校，是陈仪所创办。它不属于军统的特警班，也不属于李士珍的中央警官班，陈仪在福建时，把他们当为自己的宠儿，陈仪离闽之后，他们就夹在军统特警班与李士珍中央特警班之中，两面不讨好。我利用这个矛盾，对他们伸出友谊之手。

1947年张天昊同志介绍闽警班刘浑生同志参加《民联》。刘当时是厦门警察局主任秘书，是闽警班的头面人物。为发展革命工作，他出面组织闽警班同学会，任会长。通过这个关系，他陆续介绍同学会总干事罗星炜和数十名同学参加《民联》。这些同志都是各市县中上级干部，对我们共同的革命任务，如策反、情报、保存档案、掩护革命人士，都做出贡献。

1949年我因工作重点移到厦门，不能常去福州联系工作，将罗星炜同志及其所联系的同志交给管长塘同志，罗星炜在管同志指挥下，带动福州市、省水警总队及闽侯、长乐、连江等县警察局全员起义，收缴枪械，保存档案及肃反工作做得比较全面。

1949年6月间，原闽警班主任胡国振由台湾来厦门，阴谋用一个帮会模式的组织来拢络闽警班同学，准备潜伏各地，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个组织名“群社”，奉胡国振为“龙头”，歃血为盟。我和刘浑生研究之后，介绍《民联》同志多人，渗透进去，掌握该社的领导，从而使它解体。胡国振原想利用这个组织，潜伏福建，争取台湾当局的重视，结果一事无成。

6、创办新绿书店

抗日战争前，我和张文理、江公怀在厦门开设《生活书店》，代理上海《生活书店》所出版及所经售的书刊，对厦门的思想教育有一定的贡献。1938年厦门沦敌，生活书店被迫关闭。将好书2000余本，寄存鼓浪屿淘化大同酱油厂。抗战胜利后，我认为这些书有加以运用之必要。由厦门互惠公司拨美金1000元，配合这2000余本旧书，在厦门中山路、思明南路口开张新绿书店，按照原《生活书店》规格售卖书报。

新绿书店以我任董事长，彭剑虹为经理。经售书报以当时《三联书店》的出版物为主，也秘密经售一些进步杂志及期刊，如《解放》及华商报之类。这在厦门，不是没有阻力的。反动派曾两次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我停办。一次，反动派乘厦门大学学生反饥饿游行时，派特务渗入游行队伍，准备经过新绿书店时，以群众名义，捣毁书店。这一次《民联》在市警察局当主任秘书的刘浑生同志，派警察将带枪特务三人，从游行队伍中抓出来，当众暴露他们的阴谋。反动派这一次不逞，便另耍花招，计划向新绿书店扔手榴弹。我于掌握到具体消息之后，走访市长黄天爵，问他要不要负责保护新绿书店，如不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我要自卫，发生武斗还是要他负责。黄天爵不敢推卸责任，连声由他取缔。这又避免一次危机。经过这两次较量之后，新绿书店才稍得安定。

创办新绿书店目的在思想教育，不在营利，所以我们敞开书架，任人取阅，生意颇见繁荣。但是我们避免事故，一些中共宣传品仍以秘密方式发行，我们当日的店员，以后都成为革命

好接班人。

新绿书店到1949年8月我逃出厦门，自动关门。新绿书店的彭剑虹是中共党员，现已离休。

7、争取李汉冲、练惕生

李汉冲，闽西人，任过张发奎部军法处长。我于1945年12月在广州由黄品枚同志介绍认识。李汉冲任军法处长时，曾和黄品枚一致，营救了胡志明。这个表现，使我引为知己。

1948年6月李良荣任省主席，邀请李汉冲回闽，在考虑给他什么职务时，我建议以他为龙岩专区专员。李汉冲赴任之后，和我保持联系，还有两次来厦门找我。那时候，他已有起义思想，我却不敢直言。到1948年11月，我请黄品枚同志专程来厦，约李汉冲协商起义问题，李汉冲立即同意。

李汉冲起义之后，遣回龙岩，便大力发展组织，策动起义。他还和傅柏翠同志合作，组织武装，拥有一定实力，等候解放。

1949年2月李良荣撤职，朱绍良接任省主席，委派练惕生代换李汉冲。李又策动练惕生起义。练惕生为落实我和中共的关系，与李汉冲专程来厦门与我联系。

1949年5月间，国民党从南京、上海败退部队，相继窜到福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第九军，逃至龙岩，有夺取龙岩为基地之意图。李汉冲和练惕生、傅柏翠同志，为先发制敌计，于5月25日率部起义，攻击第九军，因实力悬殊，往闽西退却，那时候，我们同闽西游击区没有横的联系。当我们西退时，刘永生、魏金水的部队迎头堵截，使起义军处于双方夹击的地位。李汉冲紧急来厦找我想办法，我一时也措手无策，只好请李汉

冲前往香港向华南局汇报请援。那时候潘汉年已离开香港，方方同志接替他的任务。迅速通知刘永生、魏金水二同志，准予起义军靠拢，这才解围。

解放后，李汉冲任广东省政府农业厅副厅长，练惕生任福建省体委主任，傅柏翠任文史馆长，都得到安排。

8、争取林梦飞起义

林梦飞于抗战胜利后，舍弃公职定居厦门，在几个公共场合和我交流思想，使我印象深刻。从1947年他便成为我争取起义的对象。但因系初交，不敢匆促从事。

1948年春间，军统局副局长唐纵来厦门视察，我告诉他胜利后厦门政府机关及较大生意事业，都被中统占尽。军统人员，生意失据，相率走私漏税，扰乱市场，引起人民的恶评。为补救之计，我建议唐纵见到刘建绪时，向他要求拨个地盘，安置军统人员，以免发生不良后果。唐纵问我，还有什么现成的地盘可供争取。我告诉他，省政府还有一个闲缺没有派人，那就是保安司令部的民众组训处。这个职务，负责全省各县民众武装组织训练工作，假使我们争取这个职务，就可以在各县安排我们的人。唐纵问有谁可以出任这个职务，我便提出林梦飞。林梦飞是黄埔生，虽然不是军统人员，但和军统比较接近，这是唐纵所素知，所以一到福州，他就要求刘建绪委任林梦飞为民众组训处少将处长。

我们为什么要争取这缺呢？对军统人员来说，这一缺可以安排数以百计的闲散人员，让他们有事做。对《民联》的革命工作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林梦飞的起义，利用这个组织，把革命